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

○ 胡作友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在翻译领域的拓展,是 20 世纪 80 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延续,是把翻译与帝国联系起来的翻译研究。传入中国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经历了译介、评论、综合研究、应用与反思等不同层面的“理论”旅行,最终在中国生根、发芽、长大,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论接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发人深思,引导译界学人深度思考翻译学的建设问题。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国;接受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源头要追溯到后殖民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崛起于西方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理论思潮之一。作为一种理论批评话语,它首次将西方对东方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将研究重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批评上来,显示了西方当代理论批评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动向。^{〔1〕}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话语,它将视野主要集中于殖民时期结束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新表现、宗主国与殖民地文化话

作者简介:胡作友,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本文受 2012 年度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重点项目(皖-032-A)资助,系 2012 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K2012B378)、2013 年安徽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JG13012)与 2014 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论语》英译的多视角融合研究”的研究成果。

语权利关系、种族问题、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身份、第三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等问题,揭示西方强势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揭露西方霸权主义对殖民地文化统治的实质。该理论旨在消除“中心”和“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争取中西方平等对话。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也称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应用形态和研究范式。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延续了 80 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形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1997 年,道格拉斯·罗宾逊第一次提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这一术语并给以阐述,他认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也可以称为把翻译与帝国联系起来的翻译研究。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是帝国主义征服和占领弱势国家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有效工具。^[2]文化殖民者利用翻译进行意识形态的渗入来控制 and 奴役目的语国家和人民,以达到其殖民目的。该理论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不再把翻译单纯地看作一种语言学行为或传统观念上的文本转移,而是更关注隐藏在翻译背后存在的权力差异和权力斗争,注重译本生产的外部制约条件(如政治、权力关系等)和译本生产后对目的语文化的颠覆作用。

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认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关心的是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它与当代文化理论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该理论从原殖民地文化出发,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把翻译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探讨弱小民族语言文本被翻译到强大民族的语言时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利等因素的影响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3]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 C. Spivak)、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特贾思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玛利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等等。

斯皮瓦克在《翻译的政治》中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种种方法都摆到一起,她反对西方女权主义者“带翻译腔的语体”(translationese)的翻译,因为这样的语体完全失去了政治上弱小民族的个性特征和文化身份。在她看来,“翻译的政治”仍突出英语,突出其他前殖民主义者的霸权语言。^[4]

韦努蒂未使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这一术语,但他的研究却明确涉及到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在他主编的《翻译研究读本》当中,收入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相关文献,其中包括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伯曼的《翻译和异域事物的考验》等。在对 20 世纪 80 年代翻译理论的概述中,韦努蒂这样写道:“20 世纪 80 年代,在人类学地域研究和文学理论评判中出现了关于翻译的后殖民思考。尽管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里,那些对东方的民族和种族加以再现的译者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神秘,但直到 1988 年,维森特拉斐尔出版了其研究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著作以后,翻译才令人信服地被人看

作是帝国的帮凶(或颠覆者)。”^[5]可见他已经认识到翻译与殖民、政治等权利关系问题了。

罗宾逊是提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术语的第一人,^[6]他对1997年前的有关著作进行了梳理,出版了《翻译与帝国》一书。这本书主要分析了尼南贾纳、维森特·拉斐尔、埃里克·谢菲茨和劳伦斯·韦努蒂的五篇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总结翻译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有三个作用:(1)作为一种殖民的渠道,与教育保持平行且互相联系,或公然或隐蔽地控制市场和机构;(2)作为殖民主义瓦解后仍然存在的文化不平衡的掩护物;(3)作为非殖民化的一种渠道。他对翻译在殖民化和非殖民化中的作用和对非殖民化而言积极有利的翻译方法这两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尼南贾纳是曾留学美国的印度学者,主要研究印度英国文学教育的功用并十分关注英语对印度的殖民影响。在其《为翻译定位》一书中,她展现了一种“缺席的殖民主义仍然渗透其中的后殖民者”的形象。^[7]她将文学翻译视为“一种能使殖民统治意识形态结构中各霸权机构得以耳闻灵通的语言”。她所关注的焦点是英译的作品是如何被殖民主义强者利用,以构建一种经过重写的“东方”形象,并以此代表“真实”。她认为翻译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翻译作为一种实践,造就了或在其中体现了殖民主义操纵之下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铁木志科的研究重点为权利、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与翻译的关系。她的专著《后殖民语境的翻译:早期爱尔兰文学的英译》就以早期英译爱尔兰文学作品为文本,阐述传说人物 Cu Chulainn 在翻译中的变形,展示了翻译在对爱尔兰民族复兴和政治独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说明翻译与意识形态、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8]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

西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先后到来使国内学者接触到了西方最新的翻译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译学界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翻译的政治性问题,并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随着20世纪末中西方学术交流的不断加深,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传到中国,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早在1995年,在大连举办的国际文化研究研讨会和北京“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后殖民主义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到20世纪末,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很好地被移植到了中国的学术土壤。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的统计,从1994年至2013年,以“后殖民翻译”为主题可以检索到91篇期刊论文,136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0-2013年),17篇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为主题可以检索到64篇期刊论文,15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0-2013年),13篇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些译介成果对我们理解、审视、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大有裨益。

在此,我们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分为五个方面和层次:

(1)译介。自20世纪8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一时间国内出现了不少关于这一理论的译作和专著作品。2001年1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许宝强、袁伟选编的外国理论译文集《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书中收录了米歇尔·福柯、特贾思维莉·尼南贾纳、加娅特丽·斯皮瓦克、谢莉·西蒙、劳伦斯·韦努蒂等人的作品。这些译作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了翻译与政治、文化和权力关系的联系,向中国学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翻译理论。正如孙歌在为本书撰写的前言所说,“有关语言与翻译的政治,是我们大陆学人思考的一个盲点。”而这本打破“大陆学人思考中的一个盲点”,为我们开启了翻译理论研究的一扇新大门。^[9]

2005年,陈永国主编的《翻译与后现代性》是一本外国翻译理论的论文集,书中收录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雅克德里达《巴别塔》、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等论文,涵盖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最新的外国翻译理论的新图景。指出在跨文化语境下由翻译促进的国际文化交往的特征,在更深语言层次探讨了以翻译为体现的话语、意义、符号、权力、政治及其在经济和军事格局中的分量。^[1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2006年分别引进了两套大型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著作包括韦努蒂、斯皮瓦克、尼南贾纳、罗宾逊等人的7种专著。^[11]这些为我国学人,特别是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2)评论。2002年,李红满的《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话语》扼要地评述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探索后殖民理论的重要代表性著作,分析蕴涵在翻译文本之中的权利关系和历史语境。^[12]同年,他的《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一文从翻译流量、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和翻译理论话语等几个方面说明后殖民语境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在翻译出版、翻译策略和翻译理论话语的不平衡性。她提出要发掘整理传统话语,清理传统译论的重要概念和范畴体系,消解西方霸权理论话语,建构和完善非西方译论的话语系统,实现与西方翻译界进行平等对话。^[13]

2003年,王东风的《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一文给予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关键词精确细致地阐述和评论。集中解释了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主义、解殖民化与翻译策略、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和杂合化。^[14]该文剖析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来龙去脉,厘清其基础概念,分析其研究价值。

2006年,徐朝友评述了2005年荷兰本雅明出版社的《较少被翻译的语言》论文集。论文从后殖民立场,介绍了卡特兰语这种世界上少数被翻译的语言和一国之内少数被翻译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被动地位。他的这篇评述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翻译与权力的关系、国学问题、思考汉语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以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问题。^[15]

同年,邵璐向读者介绍了由谢莉·西蒙和保罗·圣皮埃尔合编的《变换术

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16] 这篇文章主要概括了这本书的结构和收录的十五篇论文的内容,指出全书的核心思想是:后殖民时代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向殖民时代的传统术语和概念提出挑战和质疑,并提出革新的方法。

2007年,柳林在《中国翻译》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中国话语》。^[17] 这篇文章主要对2000-2006年该理论研究在中国的接受的描述性探讨和分析。文章从后殖民理论的要义出发,对其在中国的译介、综合性研究、文化关怀以及中国化实践做了全面清理和剖析,向读者展现了2006年前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2007年,何高大、陈水平的《翻译——政治视野中的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话》^[18]将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摆在一起,认为这两种话语都反对一切文化霸权,把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干预手段来颠覆植根于西方哲学思想与文化中的男性与女性、西方与东方二元对立。他们认为应该把可能的各种因素纳入研究范围,使我国翻译理论走出固步自封的困境,加强学术界的理论意识。

(3)综合研究。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是国内第一部专论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学术著作。^[19] 论著从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理论话语、以及这些新的话语与当代理论话语文化的关系层面,讨论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思潮同当代文论的复杂关系;不仅注意其思维拓展打破僵化格局的积极意义、也注意到其思想价值观方面的消极意义,同时,对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文化表征作出了深切地反思,勾画出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冲突。这本专著关注了上个世纪末,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文论出现的新表现、新问题。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费小平的博士论文《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20] 这篇论文从宏大的文化层面,从翻译的政治检讨作为出发点,以政治、性别、后殖民批评等视角对翻译研究进行重新审视和探讨。这本专著有着明确的研究方向,将翻译与政治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晰、深入。谢天振给予其很高的评价,称这本专著打破了“大陆学人思考的一个盲点”。

孙会军的《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21]以翻译活动中所面临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传译问题为切入点,考察了翻译与权力关系、普遍与差异、东方主义、民主主义及杂合理论等问题,在宏观方面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解读,全面深入,见解独到。

2006年,吴文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详细细致地介绍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概念、由来、发展,与解构主义结合、后殖民写作、翻译策略、具体国家的后殖民文化考察、翻译旅行等。这本专著旁征博引,详细全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22]

(4)应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应用多是与文本翻译结合,阐述分析中外语言转换过程背后的政治权力话语。

陈历明的《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23]从后殖民主

义批评视角出发,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汉中成语翻译为例,比较了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在翻译其文化时的不同处理方式及体现的文化意识,分析了霍克斯译文中凸现的“殖民者的凝视”和杨译所呈现的非殖民化的对峙及其原因,由此陈提出,在后殖民视域的中西文化对话中,文化身份需要保留,既要“拿来”,也要“送出”,要把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主动向外传播。

王辉的《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24]以《中庸》为例,在后殖民话语视域下重新审视辜氏译经。指出辜氏译经与后殖民理论家主张的“异化”、阻抗式翻译大异其趣,着眼于儒学的道德诉求,广引西书,以证儒学的普世性,中西格义,创造性诠释,其翻译策略有助于我们推动方兴未艾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他的翻译策略有助于我们反对后殖民主义,尤其是文化殖民,重塑中国形象,夺回话语权有着启发指导意义。

此外,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也被应用于影视作品的分析。如《后殖民翻译视角下〈孔子〉的字幕翻译》^[25]、《从文化角度看〈卧虎藏龙〉的字幕翻译》^[26]等,这些文章将电影这种流行的文化传播媒介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结合,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5)反思。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引入,使国内学者将目光投入到对翻译背后的政治、文化层面的思考。它的到来犹如当头棒喝,让我们在传统译论的迷雾中找到继续前进的方向。这一理论使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翻译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

蔡新乐的《后殖民状况下还有翻译吗?——‘翻译’的再概念化简论》^[27]就关注到后殖民语境下中国汉语的发展情况。他认为我们的汉语正处于“语言失落”的状态,准确地说就是语言交流正处于后殖民状况。文化工作者或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们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翻译家。对这种状况的破除,需要对翻译进行“再概念化”:恢复其民族化、个性化语言之中的多元形式,即共存态势之中的语言转化,语言和语际翻译向个性化翻译的回归。他的这篇文章呼吁重振民族语言、保存文化传统。

而对于我们是否已被“殖民化”,胡德香《后殖民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示》^[28]中则认为,汉语并没有被真的“殖民”。尽管我国受到后殖民主义世界大气候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已经“被殖民化”,如果把防御语言因为融入了英语等外来成分就看成是被殖民化,把学习西方理论称为是自我的“失语”,则未免过于武断。正如王宁所说,我们需要分清“殖民化”和“现代化”两个概念。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现象属于后者。

而在张科荣的《知识权力与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29]中,作者思考了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他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是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对的一种文化殖民现象,后殖民主义者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伴随着的西方文化霸权的渗入,第三世界人民在中西文化交往关系中越来越边缘化,在这样的事实下,要实现中西文化的平等交往和平等对

话,首先要摆正心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取长补短,增强我们的知识权力。

《后殖民之后:翻译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30]一文反思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介入翻译后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作者认为我国翻译研究有必要全面反思中外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找出一条既植根于本民族优秀文化又借鉴到西方先进理论的研究路向。中国的翻译研究应当在走出边缘、争取自身话语权的同时谨防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力图寻求与西方话语的真正对话,达至多元共生,互动互补,从而获得研究视野的开拓和方法论的启迪。

三、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中国译界的影响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输入中国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它从政治、权力关系出发研究翻译行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这一理论的探索和学习为中国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对中国传统译论的解放。20 世纪末,伴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大量输入,特别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输入,使国内学者的目光从传统译论中解放出来。翻译行为和翻译不仅仅要追求信达雅、神似或是化境,也不应拘泥在文字对应和文本对照的两种语言的转换或两种文学关系的探讨,或是翻译的技巧、策略、翻译的标准的选择问题,而应该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把握翻译和外界的关系,特别是翻译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系。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翻译研究的新趋势,它将翻译学与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及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如符号学、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结合起来,将翻译带入到更加宏观、深刻的层面上来审视与研究。它的到来使国内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狭隘的研究视域,促进传统的译学转向和新发展。

其次,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反思。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引进后,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深度的反思。西方翻译理论到底是否适合中国的语境?如对西方译论关键词归化异化的讨论出现新的视角。在传统文学翻译中,译者常常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即使译作在目的语国家中看上去像是原作,译者“隐而不见”,翻译变得“透明”。这种翻译策略以目的语文化为中心,抹杀了异域文化。20 世纪 90 年代,韦努蒂大力提倡异化翻译策略,因为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文化掠夺行为。^[31]在后殖民理论的话语中,归化式翻译是同帝国主义的征服和殖民相联系的。归化正是征服和殖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归化作为具体的翻译手段则是对原著和出发文化的施暴,甚至是强奸。^[32]所以多数学者主张异化翻译,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这样认为。葛校琴曾就指出,后殖民视域下的异化既不忠实于原文,也不忠实于译文。异化并不一定能抵抗文化殖民,而归化倒有可能达到“以夷制夷”的功效。^[33]其实,在后殖民语境下,归化通过改写和重建,可以保留自身文化的中心地位,抵挡西方强势文化的

侵入,达到保护自身文化的纯洁和独立。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贬斥归化,标举异化”,而是客观地对待这两种翻译策略,结合文本和实际情况而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后殖民翻译理论对归化和异化的问题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再次,开放性思维的建立。吕俊曾经提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破坏性、消解性和否定性有余,而建构性不足。^[34]西方翻译学者正是基于此,在把结构拆解之后努力使结构外部的因素与原来结构内部的因素相结合,从而促进多元的重构。翻译学不是单一的语言学向度的建构,而是多元取向的重构。其路径是利用怀疑、解构与否定的精神去破坏旧的理性,发现其中的非逻辑因素,找出其理论上的缺陷,并从此入手去打开结构或系统,让其内部因素与原被排除在结构外的因素有尽可能多的结合可能,从此展现多种可能性和产生多元的研究视角。最后重新建构。我们的译学研究,从无意识的模仿到有意识的建构,从无逻辑性的散论到有逻辑的鸿篇巨制,从理论意识的觉醒到对翻译学的建设,正是要遵循一条从拆解性与破坏性走向创造性与建构性的路子,不断开拓研究领域,开放创新思维,以研究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不断接近真理,走进真理,走向译学之城巴比塔的重构。

最后,对“失语症”的反制。纵观当今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正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虽然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比较活跃,但在国际上既无影响世界的翻译译论,也缺乏影响西方社会的作品。可以说,中国的学界在国际中处于“失语”的状态,更多时候是被动地接纳吸收西方译论,在国际学术界被“边缘化”。正如张南峰先生所说,^[35]中国翻译研究正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中国翻译研究系统只能在世界翻译研究多元系统中占据边缘位置。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本身就是第三国家和政治经济文化处于被动国家中的精英知识分子旨在反对现代新的殖民者利用翻译手段进行文化剥削,争取话语权的文化行为。它的输入促使中国学者思考中国在当代国际学术界所占的地位。我们不能被动地接受,而要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要把中国的声音传遍世界各地,争取从“边缘”走向“中心”。在这其中,翻译作为强势文化控制弱势文化的手段,也是弱势文化反抗的利器。正如罗宾逊所说的那样:“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既是殖民化的途径,也是解殖民化的工具。”^[36]所以,中国学者,特别是从事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人员更应勇敢承担其责任,一方面努力译介西方优秀的理论知识,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另一方面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使之应用于中国的语境,并不断更新、构建和完善自己的学术框架和理论系统,使中国在国际学术界中占有一席之地,最终实现与西方翻译界的平等对话。

四、存在的问题分析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丰富了中国的译学思想,开拓了国内学者的眼界,给中国的译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然而,理论的接受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第一,理论译介欠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早已传入中国,也引进了相关的西方著作,如罗宾逊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西蒙和圣皮埃尔的《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铁木志科和根茨勒的《翻译与权力》等,但这些大多是原版引进,没有相应的中文版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理解的难度,可能会造成对这一理论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和解读,不利于其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第二,理论接纳分歧。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这一舶来品,我们既不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也不能毫不留情地全盘否定。一方面中国毕竟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殖民国家,不能完全照搬这一理论;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在文化上受到西方的强烈冲击。在今天的汉语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文化的影响,如,汉语语序、句法等。然而,对是否接纳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不是问题之所在,因为它已经被介绍到中国,被广大的学者了解,它已经成为中国翻译理论中的一个分支,所以,我们不应该消极的逃避它,而是正视它、研究它,让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语境下得到新的发展。

第三,对理论的误解与误读。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下,一些人夸大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认为西方文化的传入是殖民的新手段,从而畏惧西方先进思想和理论,产生盲目排外的思想。^[37]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对于消除国际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现象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批评话语传到我国后,其强烈的批评色彩在我国的后殖民批评中演变成了一种文化复仇情绪。他们从指责西方文化霸权入手,质疑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现代模式,并认为近现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在这种盲目的“排外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很可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理论,引起对理论的误解与误读。

第四,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在中国多处于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少能与中国的翻译实践相结合。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饱受半殖民的痛苦,中国的国情使中国的文化、文学作品有着中国特有的文化色彩和底蕴。如何将中国的翻译实践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结合,使之应用于实际问题的探讨将更有现实意义。

此外,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开拓更广泛的领域。比如,与政治学科的联接,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等等。

注释:

[1][2][6][32][36] Robinson Douglas,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pp. 1-10, 1, 31, 58, 31.

[3] 方梦之:《译学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4]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 p. 133.

[5]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219-220.

[7] Niranjana T, *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8.

[8] Maria Tymoczko,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pp. 23-45.

[9] 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10] 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 这七部著作是:谢莉·西蒙和保罗·圣皮埃尔《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阿尔瓦雷斯和比达尔《翻译,权力,颠覆》;罗杰·爱丽丝和奥克利·布朗《翻译与民族:英格兰的文化政治》;道格拉斯·罗宾逊《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铁木志科《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英译早期爱尔兰文学》;劳伦斯·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铁木志科和根茨勒《翻译与权力》。

[12] 李红满:《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话语》,《山东外语教学》2003年第2期。

[13] 李红满:《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4] 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

[15] 徐朝友:《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新收获》,《中国翻译》2006年第4期。

[16] 邵璐:《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评介》,《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2期。

[17] 柳林:《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中国话语》,《中国翻译》2007年第3期。

[18] 何高大、陈水平:《翻译——政治视野中的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话》,《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11期。

[19]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20] 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21] 孙会军:《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22] 吴文安:《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23] 陈历明:《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24] 王辉:《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5] 张丽云:《后殖民翻译视角下〈孔子〉的字幕翻译》,《电影文学》2011年第9期。

[26] 王鸿雁:《从文化角度看〈卧虎藏龙〉的字幕翻译》,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7] 蔡新乐:《后殖民状况下还有翻译吗?——“翻译”的再概念化简论》,《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4期。

[28] 胡德香:《后殖民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示》,《外国语》2005年第4期。

[29] 张科荣:《知识权力与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30] 张柏然、秦文华:《后殖民之后:翻译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1] 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

[33] 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

[34] 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外国语》2002年第5期。

[35] 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外国语》2001年第4期。

[37] 熊元良:《文化“失语症”:历史的错位与理论的迷误》,《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黎虹]